



走向现代性的 新诗

Z OUXIANG

XIANDAIXING DE XINSHI



苗雨时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走向现代性的新诗

ZOUXIANG

XIANDAIXING DE XINSHI

苗雨时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现代性的新诗/苗雨时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1097-561-2

I. 走… II. 苗…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289 号

责任编辑:梁志林 杨显硕 E-mail:yangxianshuo@163.com

装帧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规格:1/32(880mm×1230mm)

印张:7.625

字数:210千字

版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81097-561-2

定价:18.00元

序

陈 超

我与苗雨时教授相识已有 20 多年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我还是个大大学生时，就读到过他的诗论文章，并向诗社的同学们热情推介。那时诗坛正展开对朦胧诗的争论，苗雨时先生不但从审美情感上为朦胧诗积极辩护，而且能从学理上冷静分析其意识背景和修辞特性的渊源，这使他的文章言说有据，以理服人。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并感叹，原来“苗雨时竟在河北，而且已是个中年人！”这么感叹是因为，在我心目中，那时河北诗界是保守的，而且对新诗潮的理解肯定会有代沟的。这样，从一开始我就对年龄已不再年轻，而心灵却充满青春活力的苗雨时先生心存敬意。

记得 1985 年，我在一个诗会上第一次见到苗雨时，他的洒脱酒风就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他来者不拒，襟怀坦白，主动出击，开怀豪饮，且尽欢而不散——因为，每场大酒的最后他都要再拉住几位心意相投的青年诗人继续喝，每次最末一个离开酒桌的总是苗先生。这种做派，历 20 年而不辍，令我们几个晚生啧啧称奇。每观酒风，想其性情，生活中的苗先生也是一个融激情与诚朴，敏锐和执著于一身的人。苗先生不仅是我尊敬的老师，还是我的好友。20 余年来，彼此观念相近、心灵相知。现在，他的第五本诗学著作《走向现代性的新诗》即将出版，嘱我这个晚生后辈在前面说几句话，我将此看作是他对我们友谊的纪念。这部书汇集了他近几年中发表的诗学文章，其中一些篇章当初发表时我已看过。此番再次浏览全书，又有一些感想。借作序的机会，我想结



合这本书谈谈对苗雨时诗学批评形态的观感。

苗雨时的现代诗学理论批评，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仍然处于持续活跃状态。与理想主义的80、90年代相比，新世纪以来诗学理论批评的“蜜月期”已经结束，诗歌理论批评进入了持续的“疲惫期”。我看到，不少当年活跃的诗学理论批评家已基本丧失对诗歌本身的热情，在“历史转型”的低回感受中，对诗坛现实长久地失语，去写一些泛文化思想遣兴式的随笔、小札。另外，除少数专业人士，那些关心诗歌状况的普通读者也已很少阅读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批评文章，而铺天盖地的所谓“媒体评论”“网络点评”“舆论化评论”乃至“恶搞评论”却赢得了可观的读者群。

当然，在这种情势下，依然有少数诗歌批评家，矢志不渝地热情关注诗歌创作的现实，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苗雨时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始终对现代诗创作的现实，抱有浓厚的探询、言说兴趣的人，以他扎实的理论积累，良好的批评素养和审美感受力，在近年又陆续写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诗潮研究及诗人论文章。

在诗歌意义上坚持对现代人的“存在境况”的探询，在诗歌本体上不断追索“现代性”的话语方式，这两条彼此相关的线索一直交织在苗雨时诗学批评的整体运思中。无论是1990年出版的《诗的审美》，还是这本新著《走向现代性的新诗》，都是此一向度的不断深化。苗雨时诗歌批评的根系，就扎在对人的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上。据此，30多年来，他能不断地给自己的审美体验赋予“存在”的意义的结构，或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某种历史想象的参与。

在这本新的著作中，我们看到苗雨时的诗歌研究，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前者如《世纪之初的诗学随想》《一个需要诗人创作重要的诗的年代》《现代汉诗的基本精神：走向舒放与澄明》《诗——生命与语言的互动》，以及经由对几位诗学家的评论所阐发出的自己的宏观诗学理念等论文。后者是十数篇诗人专论，如对牛汉、绿原、穆旦、邵燕祥、郭小川、李瑛、张学梦、姚振函、大解、郁葱等诗人的深入中肯的论述。但我注意到，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在苗雨时的理论批评写作中，诗





歌的“本体”和“功能”都得到了平衡的阐释，它们牵动了诗学批评、文艺美学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关联域，使诗歌形式本体论趋向于与之相应的生存、生命本体论。苗雨时自觉地将对诗学的省察，与对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从人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去把握诗歌艺术的美，使语言不再作为狭义的修辞学意义上的“美文”，而是人与生存之间真正的临界点和困境来考察，并进而发掘出了某些诗歌现象和特定文本的深层的文化精神。这是一种将对现代诗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诗学批评方法，它对我们思维空间的拓展具有启示意义。

正是这种开阔的内外“兼治”的视野，使他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诗流向及内质的整体把握获具了某种深度。在这部书里，他涉及了诸多与当下生存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令人困惑的诗歌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针对世纪初诗学理论界普遍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二元对立的看法，苗雨时及时而准确地指出，“其实这场争论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分歧，两者都源于生命个体性的确立和语言的自觉，而诸如本土意识和叙事策略等方面，二者都是一致的。要说是有差别，它们不过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知识与智力构型，和两种不同的审美创造力形态。它们都致力于诗歌重建，这些形式和技巧，不构成真正敌对的关系。”我以为，苗雨时的这一辨认，客观而深刻，他剥离了假问题，凸显了真问题，他提出的几个关键词，有助于人们认识90年代以来两大诗歌浪潮本来可以沟通对话、秘响旁通之处，也指出他们完全可以在“怎么写”上各自独立发挥，不必互相指责。其实，这种多元对话的意识，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诗歌复杂抗辩现状的省察。

再如，在对新的历史语境下诗人应取的姿态上，苗雨时指出，“在多重文化语境的纠缠中，在社会转型的夹缝里，诗人不再是时代的代言人、文化英雄、先知和预言家，也不再是人们生活的教师与百科全书……他应该是一个感受时代‘疼痛’的幸福者，一个自我灵魂的拯救者。他在批判时代的过程中，首先进行自我批判。”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以为这是一种别样的呼唤诗人“承担”的姿态，与启蒙精神所首肯的人之为人所必备的个体主体性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精神及能力一脉相传，



但又应有敏锐的局部自我调整和自我纠正。

当全知视角和宏大抒情逊位之后，“叙事成分”对诗歌写作的进入就成为诗学的热点问题之一。苗雨时及时跟进这一嬗变，他既反对宏大叙事，但也警惕着平庸琐屑的个人“小叙事”，他提出一种“综合叙事”——“以广博的胸怀、开阔的视野，观照纷繁复杂的具体事物，包容各种异质现象和因素，并在它们的互否互渗中，于对话式的语境下，对历史、文化和各种体悟进行词语的言说。但综合叙事并不是冗杂和巨细无遗，它应该有所选择、概括和某种程度的提炼。”他在充分肯定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及物感”的前提下，依然提醒诗人们不要忘记诗歌本体意识的自觉，真正使现代汉诗“走向舒放与澄明”。在诗—语言—思的关系上，他基本认同海德格尔的理论，并对三者之间的整一关系进行了深入言说，这些文章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紧密联系诗歌创作实际，不发空言，在学术上训练有素，很少以生硬的既成“理论框架”去硬套诗歌现实，所以他对诗歌现状的论述大多能够直入腠理，令人会心，给人启示。

苗雨时在对诗人个案的研究中，同样也贯穿了这种使语言和生存同时到场的理论批评自觉性。比如对牛汉、绿原、穆旦、邵燕祥的研究，在写作意识上，他不仅从文本解读出发，同时还注重从彼时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生存情境以及老诗人们生命履历出发，以求言说有据地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比如，在对绿原诗歌的论述中，他发现了“三种话语的纠缠：知识分子话语，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民间话语……绿原的人生道路以及与此相应的诗歌道路，就是穿越这三种话语的森林，不断地辨别方向，不断地进行‘选择’的必然结果”。对“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穆旦的研究，他指出穆旦诗中丰富深邃的“矛盾性”，穆旦“总是面对着与自身灵魂的格斗，一次又一次不断给自我精神放血的过程。”在对牛汉的论述中，他抓住牛汉诗歌里的系统性“核心意象——鹰”在不同年代的演变，揭示出诗人在对现代性的追寻中丰富曲折的心灵史。再比如对邵燕祥诗歌的研究，苗雨时指出，“他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有历史感和历史想象力的独特而重要的诗人”，诗人一生的追

寻，“既有好梦，又有噩梦。有好梦的破灭，也有噩梦的惊醒。其中涵泳着沉浮起落的是他的灵魂……在驯服工具与道德良知之间，在灵魂的失落与寻找之间，诗人内心的挣扎与搏斗是极为痛苦的。”正是这种求真意志，才使诗人在作品中真正“留下了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

我感到，苗雨时在论述这些老诗人时，其实也是以相似的“历史同情”的视角表达着自己的“历史想象力”。他们在他们的诗中辨析着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对他们诗歌文本的解读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升发出具有历史反思性的力量来。这样就对这一代老诗人的创作道路、话语形式、诗体特性的论析，基本做到了由表及里，从形到神的独特的揭示。苗雨时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简化问题的复杂性，他深入到了这一代所置身的诸多价值龃龉和分裂中，指出正是在对这种龃龉和分裂的动态把握和整合，他们才得以创造出与自己的生存处境相对应的厚重而真切的生命之诗。同样，本书在对当代诸多中青年诗人的论述中，苗雨时也大都满足于就诗论诗，而是平行附之以话语的历史生成的观照角度，使自己的诗评获具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语境的纵深感。

总之，这本诗论集中的文章都程度不同地体现着一种以话语的历史生成为重心，并由此激活文化阐释、本体研究的新的综合批评模式。在我看来，苗雨时的综合性的历史语境批评，也没有忽视对诗歌的艺术形式研究。它们不过是扬弃了以往诗歌文体形式学把文体形式局限在单一范围内的狭隘观点，而是把文体形式看成一个更大的诗学系统中的要素。其中，论者对诗歌的语言特性、吟述方式、隐喻和象征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等的研究，是同步于对诗人所在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研究的。这样一来，诗歌研究就成为生存与语词共在的场所，从历史话语与诗歌本体两相融会的角度的切入，使他比较有效地打通了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

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部诗论中也难免有“友情出演”式的平平之作，但总体来说，我以为上述所谈及的两类文章，是颇有价值的。作为晚辈，我谨祝苗雨时老师继续“豪写”，继续“豪饮”，使文章老而弥



深，酒量老而弥高。
是为序。

2009年4月28日



目 录

序	(1)
1 世纪之初的诗学随想	(1)
2 一个需要诗人创作重要的诗的年代	(9)
3 现代汉诗的基本精神走向舒放与澄明	(13)
4 90 年代诗坛的一场论争	(16)
5 广博而深邃的“诗学工程” ——评杨匡汉新著《诗学心裁》	(20)
6 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 ——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	(25)
7 诗——生命与语言的互动	(37)
8 符号诗学二题	(40)
9 诗歌的生命形式	(48)
10 一个诗人灵魂的悸动和敞亮 ——读张洪波《诗歌练习册上的手记》	(52)
11 断裂带上:生命之树长青 ——谈“灾变意识”并评灾变诗	(58)
12 生命的诗与诗的生命 ——试论牛汉诗歌创作的现代性	(64)
13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中搏动的灵魂 ——论绿原其人其诗	(68)
14 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 ——穆旦论	(76)





- 15 赤诚情愫绽放的艺术枝条
——李瑛论…………… (84)
- 16 一个不断寻绎灵魂的诗人旅程
——邵燕祥论…………… (98)
- 17 在艺术的丛莽中开辟“新的出路”
——试论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历程…………… (107)
- 18 现代精神的歌者
——张学梦论…………… (121)
- 19 重返故乡的悲壮旅程
——评大解史诗性长诗《悲歌》…………… (127)
- 20 重读姚振函…………… (132)
- 21 童年回忆中的生命寻绎
——评刘松林组诗《梦里平原》…………… (135)
- 22 寻找我们精神的血源
——评刘福君诗集《父亲》…………… (137)
- 23 吟咏动物 寄意人生
——读姜宇清诗《青蛙(外二首)》…………… (141)
- 24 人生诗化与诗化人生
——评郁葱的诗…………… (146)
- 25 走向现代性的精神高位
——评徐国强诗集《在落叶上行走》…………… (149)
- 26 一个青年哲人的生命歌吟
——评《云江诗选》…………… (153)
- 27 城市中,灵魂的徘徊与放飞
——评靳亚利的诗…………… (157)
- 28 一个智者与世界的对话
——评《王克金的诗》…………… (160)
- 29 从天真到经验的女性生命的咏唱
——评王秀云抒情诗选《长庚》…………… (165)

- 30 女性生命爱的思絮的放飞
——评王庆芳诗集《梅叶的飘落》…………… (169)
- 31 中西文化场域中的独立自我的情愫
——评张秀梅诗集《闲散时刻》…………… (172)
- 32 乡土文化沃野生长的现代艺术花束
——论陈有才的民歌风的新乡土诗…………… (177)
- 33 构筑乡土的现代神话
——评王耀东的乡土诗…………… (187)
- 34 清风朗月下的诗魂
——评王雪莹诗集《我的灵魂写在脸上》…………… (191)
- 35 纯美平和中蕴涵着峭拔的精神内核
——评《纯生诗选》…………… (195)
- 36 《丑石》三诗人简评…………… (200)
- 37 世纪风中,绽放的生命花蕾
——评叶玉琳诗集《永远的花篮》…………… (207)
- 38 风中,摇曳着一株会思想的芦苇
——评马也诗集《二胡的第三根弦》…………… (211)
- 39 守望精神家园
——评何刚诗集《寻找桃花源》…………… (214)
- 40 人与自然的谐奏
——评郭友钊的科学诗创作…………… (219)
- 后记…………… (228)





1 世纪之初的诗学随想

文化漩涡中的诗歌

当今中国大的文化历史语境，表面上波澜不惊，没有大的文化事件，但是底层里却是暗潮汹涌，是这汹涌的暗潮形成的文化漩涡。八九十年代之间，由于神性的隐退和“他者”的侵入，在文化的变革与开放中，曾是众声喧哗，涛飞浪溅，呈现了人们文化心态的焦灼与浮躁。世纪之初，渐渐归于平静的反思，但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且不说作为“他者”的各种哲学思潮、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消化和与本土文化传统的融合与对接，远没有实现，就是作为中国当代三种文化形态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它们之间的冲突、互否、交插、渗透也正急剧地展开，似乎是悄无声息的，却引发了文化深刻的变构。特别是市场经济机制催动的市场文化飞流直下，搅动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深潭，冲击得权威失落，精英迁移，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不再具有支配性，从而形成了一种世俗的“众神狂欢”的局面……

中国新诗处于这种文化漩涡之中，陷入一种哲学的玄晕和诗学的迷惘，六神无主，居无定所，其必然的命运不是沉入谷底，就是滑向边缘，成为泡沫……

当前诗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是人生价值的危机，也是诗人存在性的危机！

诗人的苦恼与无奈

杨匡汉先生曾总结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特征是：过渡性、复杂性、离折性。的确，一切都在变动，一切都在转折，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无定型，有的甚至转瞬即逝，今日翠绿，明日枯黄；而且，一切都繁复、冗杂，各种观念，各种生活方式，各种价值取向，各种人生欲求……多元并峙，多义共生，说不清的斑驳，道不尽的混乱；同时，一切都在冲突、断裂与崩解：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终结与发端，父与子、男与女、灵与肉、生与死……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诗人何为？诗歌何为？这一切就成了诗歌创作需要思考的不得不又一次重临的起点。诗人在审视时代同时，也开始审视自身，结果发现自己的生命已处于悬浮状态，它已支离破碎了，它已空洞化，成了“空心人”。空虚，无奈。活着，还是死去，就成了一个问题。于是诗人落入无尽苦恼的深渊。

外冷内热的诗坛

八十年代诗歌的激情、激动过后，进入九十年代，一切都成了弥足珍贵的怀念。诗歌开始被冷落，它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已经滑向边缘，而市场经济及其文化大行其道，物质的肥富与精神的贫困形成巨大反差，诗歌一步步跌入灰色的年代。然而，仍有不少诗人执著于诗歌，进行各自的艰难的探索，但他们又不甘于寂寞和无声无息，于是九十年代诗坛掀动了一场关于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令人奇怪的是诗坛内吵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而诗坛外却无人理会，没有任何反响。这不知是诗歌之幸，还是诗歌的悲哀。其实这场论争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分歧，两者都源于生命个体性的确立和语言的自觉，而诸如本土意识和叙事策略等方面，二者都是一致的。要说是有差别，它们不过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知识与智力构形和两种不同的审美创造力形态。





它们都致力于诗歌重建,这些形式和技巧,不构成真正敌对的关系。这场论争多少带点意气用事和人为的痕迹,所以不久也就消歇了。如果说它在诗歌“怎样写”的层面,还有些价值和作用的话,那么目前一批更年青的诗人正在鼓动的“下半身”写作,就只能说是诗歌的自娱、自谑和自我消费、自我享受了。上半身写不好,或不会写、无法写,那就写“下半身”。这样一来,诗就真正赤裹裹地还原到了人的生物性原生态,这固然可以彻底剔除附着在人身上的文明污垢和各种遮蔽,然而不管你生命力多么强健,但经过一次次肉身快感和写作快感之后,接着而来的只能是完全的“阳痿”和疲软……

那么,诗的出路在哪里?如何做一个贫困时代的诗人?

“重新做一个诗人”

九十年代是出现了一些诗人的,他们也进行一些各自的探索,并取得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但个人化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平面化的民间写作,在楔入当下时代方面还嫌不够,或者还缺乏现实经验的包容力度和显得表层化。用陈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欠缺“历史的想象力”。

在多重文化语境的纠缠中,在社会转型的夹缝里,我们的诗人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和姿态?诗人不再是时代的代言人、文化英雄、先知和预言家,也不再是人们生活的教师与百科全书,他已从这些方面退守了。但真正的诗人仍然应该在文化历史的时代旋涡中,确立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找到生存下去的精神支点。

当今的诗人,应该是一个“冒险者”,一个“沉入深渊者”。“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以复杂的语言与复杂的世界对话,在时代的贫困中寻找改变贫困的时代的力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他一刻也不可擅离的艺术宿命。

他应该是一个感受时代“疼痛”的幸福者,一个自我灵魂的拯救者。他在批判时代的过程中,首先进行自我批判,他愿以自己的毁灭来换取神圣世界之降临,就象鲁迅自比野火,渴望地火来烧那样……

他应该有一种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诚如刘再复在《寻找的悲歌》中所说：

……我相信，冥冥之中有那么一颗心。那一颗使四面八方的眼泪可以汇聚成沧海的心；那一颗使人们都爱母亲，爱孩子，都向正义之门踏进的心；那一颗让人类在毕加索的和平鸽面前低首沉思的心；那一颗使所有的生灵都懂得忏悔、懂得羞耻、不会因无知而无畏、也不会因无耻而无畏的心；那一颗永远谴责着邪恶、谴责着自私、谴责着嫉妒与虚伪的心……

这颗心的名字，就叫做“良知”！

一个诗人永远不要轻贱自己，做弄自己，不把别人当戏子，也不把自己当戏子。如果他上演人生的活剧，那也应象海子、骆一禾、昌耀那样，是一场真正的生命悲剧！

诗与现实的对话

陈超在《深入当代》一文中曾说：“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

现实生活是复杂的，纠结着多重矛盾，但无论如何严酷和烦难，也是不容逃避的存在。诗人不能闭上眼睛，疏离现实，而要自觉地深入它，把它包容进诗歌，完成对其命名、剥离、批判、拆解。但要把现实转化为诗，不仅要有艺术的处理，还要经过诗人意识形态视域的介质。这里的意识形态不是指政治泛化的权力话语，而是多重观念在内心世界的重新排序和编码。巴赫金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中说：“生活，作为一定行为、事件或感受的总和，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的棱镜的折射……才能形成情节、本事、主题、母题，设有经过意识形态折射的所



谓原生现实，是不能进到文学的内容中去的。”这种论述，当然也适用于诗歌，就是人们常说的“思想中的现实”。

面对中国的现实，我真希望能出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把中国这纷乱如麻的事情说清楚，然而这样的哲学家并没有出现。因此，这理清乱麻的使命，只有由诗人们自己承担。与现实对话，需要大智慧，只有大智慧，才能传达出历史真实的声音。这一智慧应该是整体性的，哲学性的，它需以社会进步为导向，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这些文化的子系统，结撰成一个多维的、动态的、有机的大系统，但不是以人为顶点的金字塔结构，而是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互为生态、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一个和谐的整体。以这样的智慧观照中国现实，庶几能弥合断裂，整合破碎，填充心灵，使诗歌创作具有生活的包容性、平衡性和历史的真实性。

第一流哲学家可能是第三流的诗人，但第一流的诗人必须是第一流的哲学家——诗化哲学家！

综合叙事与隐喻

一般哲学，是理性的、思辩的，但真正的哲学也应建基于哲学家个人命运和人生体验之上，不过仍以前者为要。而诗人则正好相反，他们往往是纳大千于芥子，由日常而入历史，靠的是生命个体的具体而深邃的感受、体验和领悟。外在世界只有先化为诗人生命的本质，才能呈现为诗的独特图景。当然这里还需要一系列艺术提升和语言运用。

复杂的艺术和生活的复杂是异质同构的。以综合叙事的艺术方式来表现多维时空流动的矛盾关系，这也许是中国现代诗歌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技巧。犹如模糊数学研究模糊现象，是真正的科学一样。而所谓综合叙事，就是以广博的胸怀、开阔的视野，观照纷繁复杂的具体事物，包容各种异质现象和因素，并在它们的互否互渗中，于对话式的语境下，而应对历史、文化和各种体悟进行词语的言说。但综合叙事并不是冗杂和巨细无遗，它应该有所选择、概括和某种程度的提炼。它不

